第 一 编

11 世纪前中国与西方诸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
——吐火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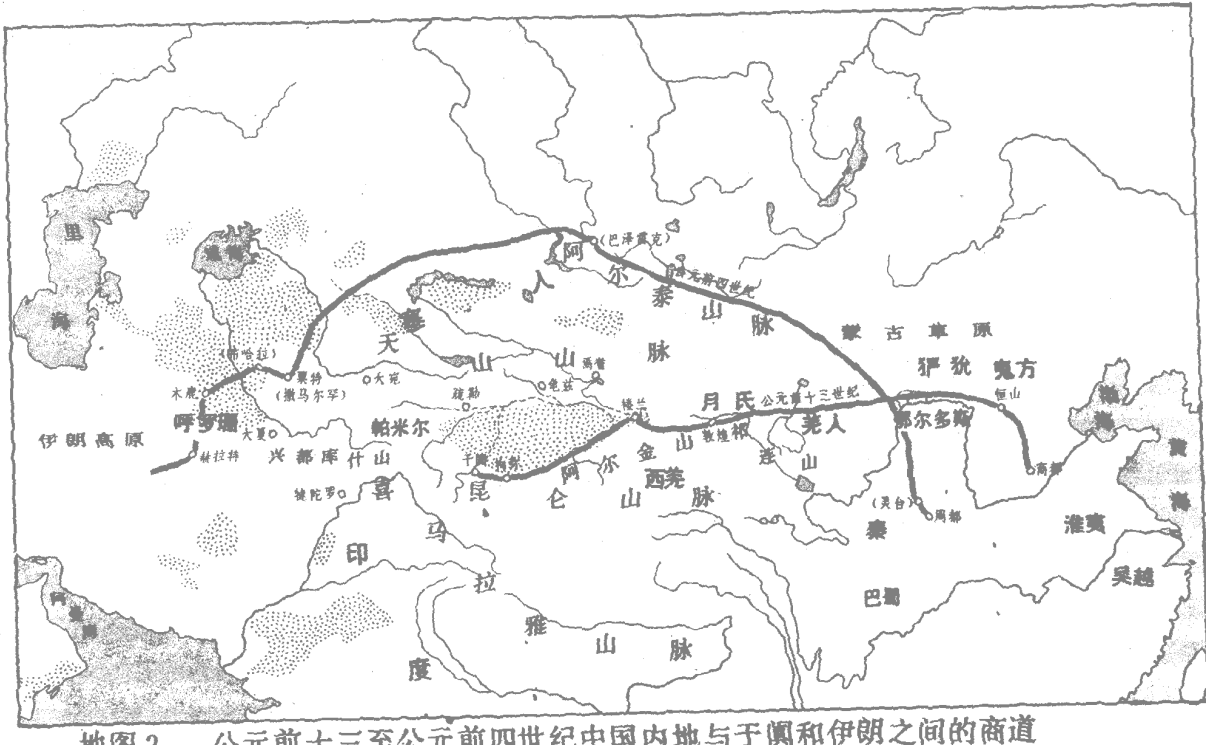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普遍相信，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操古印欧语的民族生活在远离欧洲的中亚沙漠。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的古代遗址及敦煌莫高窟（参见黑白图版 1）中有这个民族留下的大批宗教、文学和医学文献。在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中，他们的语言被称为“ Toγri 吐火罗语）”[①]。据比较语言学研究，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 Centum，它与赫梯语（Hittite）的关系及其他古语特征，使其有可能成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印欧语言之一。

吐火罗语文献分别用两种方言写成，一种流行于龟兹和巴楚，另一种流行于高昌和焉耆[②]。吐火罗语还有第三种方言保存在佉卢文书中。这些文书出自塔里木盆地楼兰-鄯善王国的遗存。佉卢文（Kharosthī）本是书写犍陀罗语（Gāndhārī，或称印度西北俗语）的一种文字。但是，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佉卢文的语言不是单纯的犍陀罗语，它混杂有许多土著方言因素，这些土语因素类似于吐火罗语[③]。显然，犍陀罗语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前，楼兰人说的是一种吐火罗语方言。换言之，楼兰人是吐火罗人的一支。关于吐火罗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月氏人可能也是吐火罗

人的一支[4]。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月氏人西迁葱岭之前在中国西部地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以前，有些学者根据月氏后裔留在葱岭以西的碑铭试图证明月氏是操伊朗语的塞人的一支。这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在中国史料中,塞人与月氏人的区别非常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况且,吐火罗人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羌人分布在河西走廊，月氏人主要活动于吐火罗人与羌人之间的敦煌至祁连山一带。从他们分布的地理位置可以推测月氏的族属不是吐火罗就是羌，不会是远在吐火罗之西的塞人。更多的材料支持月氏是吐火罗人一支的可能性。例如：古代印度学者迦尔汉(Kaḷhaṇa)在他编纂的罽宾史《王河》一书(Rājataraṅgiṇī)中称迦腻色伽(Kaniṣka)和胡毗色伽(Huṣka)等月氏王为吐火罗(Turuska)之后裔[5]。此外,很难相信那兰(A. K. Narain)关于吐火罗人起源于中国的理论。首先，吐火罗人操的语言已经暗示他们来自西方。第二，人类学材料又表明吐火罗人具有白种人体质形态特征。例如：斯坦因(A. Stein)和斯文赫定(S. A. Hedin) 在塔里木盆地曾发现大批中欧和北欧人的骨架。这些骨架出自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墓葬中[6]。所以,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吐火罗人。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吐火罗人何时从西方迁入塔里木盆地。新疆楼兰一次新的考古发掘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79 年，楼兰遗址附近的古墓沟墓地发掘出 42 座墓葬。(参见彩色图版 3)葬俗有浓郁的游牧部落文化特征。随葬品组合为毛织物、皮革制品、木碗、木盘和少量铜器；缺乏反映农耕文化的陶器[7]。据近年来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一前 3 世纪) ，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丝织品和漆器等汉文化因素[8] 。古墓沟的墓葬不见丝和漆，故其年代应在公元前 7世纪以前。这里四座墓的六个碳-14 年代数据集中在距今 4300 至



地图 2. 公元前十三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内地与于阗和伊朗之间的商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400年之间,相当于中国商周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墓中的骨架具有白种人体质特征并与北欧人头骨类型相近，故被归入白种人早期类型[9]。楼兰的这个新发现把欧洲人或说吐火罗人入居塔里木盆地的时间提前了 1000 多年。

早在中国的商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民就和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流域的居民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 1976 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出土文物 1600余件。其中 750余件是玉石雕刻品。据鉴定，这些玉雕的材料全是新疆昆仑山生产的和田玉[10]。因此，它们有可能就是中国先秦文献经常提到的“昆山之玉”。这个发现为证实新疆昆仑山至河南商都有一条古老的商道的传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这条通道是如何开辟的？和田玉又是如何千里迢迢运至黄河流域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从中国史料可以知道，月氏人在塔里木盆地和黄河流域之间的早期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起了媒介作用。

月氏或称禺知、禺氏、牛氏，在中国先秦文献中经常与玉相提并论。《管子》一书就有四篇谈到‘玉起于禺氏’[11]。众所周知,月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大,自塔里木盆地直讫鄂尔多斯草原。显然，月氏仅仅是这条商路上的中间商，不是和田玉的开凿者。目前，匈奴、乌孙和塞人文化已被用来解释天山至鄂尔多斯一带的游牧部落遗存，但是，还没有人宣称发现了月氏文化。事实上，这些游牧部落的考古文化面貌很接近，我们有时很难分辨孰为乌孙？孰为匈奴？月氏人的遗存完全可能已经发现，但限于我们的知识至今不能认识。

在中国史料中，匈奴、乌孙和塞人在中国的兴起较月氏晚得多。匈奴始见于《战国策》、乌孙始见于《史记》而塞人在《汉书》中才初次提到。直到西汉初年（公元前 209 年),中国北方草原还是‘东胡彊而月氏盛’[12]。换言之，先秦时期月氏在中国西北地区是一个

相当强大的游牧部落。因此，他们在中国古代遗存中不能不留下踪迹。

1976 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了一座西周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兵器,发掘报告称之为‘人头銎钩戟’。戟上的人头像活脱脱勾画出一位具有白种人体质特征的游牧民：长颅、深目、高鼻、窄面、薄唇,头戴护耳尖帽[13]。白种人的形像在西周文化遗存中不是孤立存在的。类似的头像还见于两件蚌雕，它们是 1980 年在陕西扶风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表现出下列白种人体质特征：长颅、高鼻、深目、窄脸、薄唇。这两个头像也戴着尖顶帽子,但尖顶被锯掉。帽顶锯出的平面上刻着卐字符号[14]。

以上三例表现白种人形像的人头像当然不会来自遥远的欧洲。人类学调查又表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游牧民墓葬中的骨架属于蒙古人种[15]。这样，我们不得不考虑它们可能是属于白种人的吐火罗人的形像。在楼兰、焉耆和龟兹等吐火罗各支系中它们更可能属于月氏人的形像。正如前文所说，月氏人实际控制着塔里木盆地至鄂尔多斯草原广大地区。其他支系的吐火罗人很难越过月氏人进入黄河流域。

在考古报告中蚌雕人头像被认为是希腊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笔下的尖帽塞人。其实,吐火罗人也有这种帽子,并在塔里木盆地，尤其是楼兰尼雅一带大量发现。此外，由于吐火罗人的阻碍，塞人很晚才和黄河流域的居民发生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史料很晚才提到塞人的缘故。因此，这些人头像与其说是塞人不如说是月氏人。

蚌雕上的卐字符号值得注意。类似的符号见于月氏人的遗存。1978年，阿富汗喀布尔西北 340 公里的席巴尔甘金丘发掘了六座墓葬[16]。墓葬年代断为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故墓主人被认为是当时在这里生活的月氏人。发现物约有 2万余件,主要是金

器。其中一件金剑鞘的边缘镂刻了许多卐字符号作为装饰。尽管这种符号的含义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它为探索带这种符号的头像的族属提供了一个依据。

据以上讨论，中国发现的具有白种人体质特征的骨架和人头像属于吐火罗人。从语言角度，吐火罗人可分为龟兹、焉耆、楼兰和月氏四大支系。其中，月氏人在中国与西方早期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他们开辟了一条从和田昆仑山至黄河中游地区的商道。这条商道起初是为运送和田玉而开辟的。后来，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陆路就是在这条商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史记·赵世家》有一封苏厉替齐国写给赵惠文王的书信(约公元前 283 年)。信中说，假如秦国出兵逾勾注山，切断恒山一线，则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由此可见，这条商道是从黄河中游，经今山西境内，至鄂尔多斯然后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最后抵达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和田。先秦小说《穆天子传》介绍了不少西域地理情况，颇像一本商业旅行指南，它的产生大概就以这条商路的开通为背景。俄罗斯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Pazyryk)墓地的发现表明，至迟在公元前 4 世纪，塞人也参与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17]。他们在开辟从阿尔泰山至黑海北岸以及伊朗高原的商路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正由于这些游牧民族的活动使欧亚大陆诸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在遥远的古代业已开始。

注 释

① F. W. K. Müller und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 1916, pp. 416－417.

② W. Krause u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buch, Band 1 . Heidelberg, 1960, pp. 37－38.

③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1937, pp. vii-ix.

④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sel, ed. by G. L. Ulmen, The Hogue: Mouton Publishens, 1978, pp. 215 — 230; A. K. Narain, "On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The Tokharian-Yü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in: Papers on Inner Asia, No.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1978, pp. 1—28.

⑤ A. Stein, Kaḷhaṇa's Rājatarangṇī,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mīr, vol. 1, 1900, 168.

⑥ A. Keith, "Human Skulls from Ancient Cemeteries in the Tarim Basin", JRAI, 59, 1929, pp. 149—180; C. H. Hjortsjö und A. Walander, "Das Schädel und Skelettgut der Archaölogischen Undersuchungen in Ost-Turkistan", in: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China vol. Ⅵ. Archaeology 3, Stockholm, 1942.

⑦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1 期第 117—127 页。

⑧ 莫明华:《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

⑨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6 期。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 11—19 页。

⑪ 这四篇的篇名是《国蓄》、《地数》、《揆度》和《轻重》。

⑫ 参阅《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2887 页。

⑬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第 99—129 页。

⑭ 伊盛平:《西周蚌雕人头种族探索》,《文物》1986 年第 2 期第 46—49 页。

⑮ 韩康信、潘其风：《中国古代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45—263页。

⑯ V. I. Sarianidi, "The Treasure of Golden Hill",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pril. 1980.

⑰ E. C. Bunker, C. B. Chatwin and R. 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1970, p. 61.

（本篇为联合国教科文丝绸之路整体研究1988年日本大阪国际讨论会的大会发言，汉译文载《文物》1989年第1期；英文载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27, Osaka. 1992）

二、公元 100 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

远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1275 年抵达元上都之前 1000 多年，曾有一个罗马商团经丝绸之路沙漠路线来到黄河流域，惊动了东汉洛阳宫廷。这是欧洲与中国有据可考的首次直接交往。范晔的《后汉书》和古罗马推罗城作家马林(Marinus of Tyre)的《地理学导论》都著录了古罗马人这次神秘的中国之行。《后汉书》的记述极其简略，《地理学导论》虽然较详细，但经历代辗转抄录，不无鲁鱼亥豕之讹。特别是帕米尔东西许多地理名词系西域本地语言名称，和其他古希腊罗马地志及汉文史籍有关中亚和中国地理的记载往往大相径庭，至今不能完全落实。中亚考古及出土碑铭写卷的研究近一个世纪来不断有新的突破。例如：我们从楼兰佉卢文书和敦煌汉长城烽燧所出粟特文古书信得知许多丝绸之路古城的胡语名称。这就为研究罗马商团入华所经山川城镇提供了重要线索。本章力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中亚古代语言的研究成果，结合汉文史籍，探讨罗马商团入华时间和旅程，以期澄清欧洲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 交通路线参考卷首地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惊动东汉宫廷的罗马商团

关于古罗马人出访洛阳之事，《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载：

> 冬十一月，西域蒙奇（Macedonia）、兜勒（Tyre）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颁发“金印紫绶”的仪式显然是在洛阳宫廷进行的。但这些远方来客究竟来自什么国家历来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蒙奇”是安息王朝东部省份 Margiana，[①]‘兜勒’是贵霜王朝统治下的 Tukhāra。[②]笔者不同意这些说法。因为，《后汉书·西域传》称前者为‘木鹿’，称后者为‘大夏’。同一本书似乎不会对同一地方采用两种称谓。同时，该书《西域传》又载，西域都护班超经营西域（91—102 年）获得巨大成功：

> 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Antioch）、安息（Arsacides）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波斯湾）而还…… 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此处明言蒙奇和兜勒为‘远国’，应属‘西海’以远；‘四万里外’的国家。木鹿在今土库曼斯坦东南境马里，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两地均为中国近邻并非‘远国’。张星烺首先提出‘蒙奇’即 Macedonia 马其顿），无疑是正确的。马其顿是罗马帝国一个行省，在今希腊半岛，可谓‘远国’，但他同时把‘兜勒’比附为中国邻邦‘大夏’则不无商榷之处。[③]莫任南曾指出其误，但他把‘兜勒’和 Thraca（色雷斯，今土耳其北部）相联系，则不能视为定论。[④]据笔者所知，没有任何例证能说明 Thraca 在古汉语中可以读作“兜勒”。笔者认为，其名应是地中海东岸城市 Tyre 的音译，或译推

罗。在希腊拉丁语中 y 往往读成 ōu 或者 u ,如希腊语地名 Thylē 或读 Thōulē ,拉丁语作 Thyle 或 Thule ,[3] 可见 Tyre 可读作 Tōurē 或 Ture。笔者深信‘ 兜勒 ’即 Tyre 的音译。推罗城是罗马帝国东方行省重要的港口城市，在今黎巴嫩提尔城。前文介绍，唯有推罗城地理学家记录了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可见这支商队中有推罗商人，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到马其顿，而绕道推罗城，以致和推罗城马林相遇。

东汉永元年间正值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 Antonines)统治时期,《后汉书 · 西域传》称之为‘ 大秦王安敦 ”。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图拉真(Trajan ,98—117 年）。他一方面继前两任皇帝的遗业在莱茵河一处国境线上忙于修筑罗马边墙 (Limes) ,另一方面积极筹划向多瑙河北岸达西亚王国扩张，以期建立新的罗马行省。由是观之,图拉真似乎不可能在这个时刻向遥远的东汉王朝‘ 遣使内府 ”。显然，惊动东汉宫廷的罗马人是一批冒充使臣的商贾。所以，本章称他们为‘ 罗马商团 ”,而不称‘ 罗马使团 ”。

公元 1 世纪末，世界诸帝国势力范围是：罗马统治欧洲南部、北非埃及、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安息称雄两河流域，中亚和印度为贵霜盘踞。东汉和帝永元初年（ 89—91 年),窦宪及部将在燕然山(杭爱山)、伊吾卢(哈密)和金微山(阿尔泰山)三战北匈奴,匈奴主力被迫离开家乡向欧洲远徙。公元 90 年,班超率部击败贵霜月氏副王谢七万大军向葱岭（帕米尔） 以东的入侵。此后又任西域都护 11 年(91—102 年),保障了葱岭以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其间(95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后汉书 · 西域传》载,甘英经大夏、木鹿进入安息境内。

自安息(国都和棲城 Hekatompylos ） 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Ecbatana ），从阿蛮国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 Ktesiphon),从斯宾国南行渡河(幼发拉底河),又东南(原误作西

南)行至于罗国(条支城，Anotioch-Charax）九百六十里，[6]安息西界极矣。由此(波斯湾)南乘海，乃通大秦国(罗马城)。按现代地理叙述，甘英从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经土库曼斯坦南境马里进入伊朗，再经伊朗北部达姆甘，至伊朗西部的哈马丹，西南行至伊拉克巴格达南底格里斯河畔的泰息丰，然后东南行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汇流后下游古代河口地区。甘英此行的目的地显然是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公元前 100 年左右希腊航海家希帕鲁斯(Hippalus）发现季风以来，丝绸之路的海上贸易迅速增长。公元 1 世纪，罗马人又开辟了罗马城至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航线及埃及至印度的红海航线，以打破安息人对丝路贸易的垄断。《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与安息、天竺(印度)交市于海中"，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罗马人与印度和中国当时的经济往来主要是海路贸易，凡到罗马城的东方商人须取道海路。这是甘英欲在波斯湾渡海去罗马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甘英听信安息水手海途危险的恐吓，临波斯湾踌躇不前，失去了在公元 1 世纪出访罗马的机会。他此行虽无功而返，但向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西方国家通报了中国的广阔富饶，于是招来大批西方使臣和商贾。罗马商团之所以来华显然与甘英出使安息有直接关系。他们大概曾在安息与甘英相遇，得知中国的情况，于是在甘英归国(97 年)后第二年踏上通往中国的旅途。

甘英不曾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但《后汉书·西域传》却有专章介绍大秦国政治、经济、地理、物产和风俗。这些材料的来源有一部分是甘英在安息听人介绍的，但绝大多数应得自公元 100 年来洛阳的罗马商团的介绍。

（二）马其顿巨商梅斯的《中国见闻录》

记载罗马商团来华的唯一西方文献是《地理学导论》。作者马林是罗马帝国东方行省推罗城人，约生活在公元 1 世纪末至 2 世纪初。英国学者胡德森(G. F. Hudson)《欧洲与中国》一书把罗马商团来华时间断在公元 2 世纪前半叶，恐有误。[7]法国学者佩迪什(P. Pedech)考证，马林收集的文献资料止于第二次达西亚战争(105－107 年)，他不知图拉真对安息的战争(114－116 年)。[8]那么，《地理学导论》成书于 107－114 年之间。该书所述罗马商队往返中国的时间必在公元 1 世纪末至 2 世纪初这段时间。除利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外，马林还向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贾广事搜集地理资料，尤其是采访了专门同中亚和中国做生意的马其顿巨商梅斯(Maes)。马林的中亚和中国地理知识均来自这位马其顿人的东方见闻。他在《地理学导论》(Ptolemy. Ⅰ. 11. 6)中介绍：

> 有一位叫梅斯的马其顿人，又名提香(Titianus)，此人和他父亲一样，以经商为业，他曾记录了这段距离。尽管他本人不曾到过赛里斯国(Seres，即中国)，但他派代理人去过那里。

从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无论时间、地点和人物，《后汉书》所谓马其顿和推罗‘使臣’无一不与《地理学导论》介绍的马其顿人梅斯为首的商队相吻合。

令人遗憾的是，马林的原作没有流传下来。若不是另一位古罗马地理学家转录了马林关于中亚和中国地理的论述，罗马商团来华路线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世界地理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85－165 年)。托勒密大概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发现《地理学导论》的，他在自己的《地理志》绪论中抄录和评述了马林关于中亚和中国的论述。《地理

志》约成书于公元 150 年,距马林著作成书时间不久。但是,托勒密自称抄录《地理学导论》时作了补充和修改。此举实在多余。我们看到,经他修改,许多中亚和印度城市编入了中国境内。这是目前无法搞清梅斯所述一些中国山川城镇究竟指何地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问题不应该全由托勒密一人负责。马林著书旨在说明地理,他自然要根据其他资料对梅斯所述进行加工处理,这个环节也会出现差错。此外,梅斯本人没有亲自到中国,他转述代理人介绍的中国地理情报未必都十分准确。尽管如此,马林和托勒密仍不失为世界地理学史上最伟大的先驱者。他们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古代西方有关中国地理的唯一资料。考古发现和中亚古代写卷的研究可以证明,他们创立的中亚和中国地理学说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些地理描述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

托勒密《地理志》的版本研究,西方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不是问题所在,这里不详细讨论。但本章采纳的版本需要说明。托勒密《地理志》有关中亚和中国的章节实际抄自马林,目前有两个颇具权威的辑本值得参考。其一是英国学者玉尔(H. Yule)1866 年出版的两卷本《古代中国闻见录》,[9]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册将其译成汉文并附有简略的注释。其二是法国学者戈岱司(G. Coèdes)1910 年出版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录》,[10]耿升 1987 年将此书译成汉文出版。[11]戈岱司纠正了玉尔在地名拼读和希腊文译文方面的一些错误并在其索引中收录了李希霍芬(B. V. Richthofen)、玉尔和斯坦因(A. Stein)等著名东方学家对中国和中亚地名的考订。为便于考释。本章所引马林《地理学导论》和其他希腊罗马文献悉依戈岱司的著作,耿升的汉译本译文甚佳。笔者基本依据他的译文,但根据原文和自己的研究重新考虑了地名和个别辞句的译法。

（三）从洛阳到地中海东岸

根据梅斯的说法,马林在《地理学导论》(Ptolemy. Ⅰ. 12. 5—7)介绍了马其顿与大夏之间的交通。这条路应视为梅斯所率商队到中国去的旅程。它从马其顿出发，经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幼发拉底河上游汜复城（Hierapolis),进入安息西境阿蛮城(Ecbatana)、里海之门(Hyrcania)、安息国都和棱城(Hekatompylos),至安息东境亚里城(Aria)，然后北上安息东北边境木鹿城(Margiana)，再西行至大夏首都蓝氏城（Alexanderia－Bactria)。按现代地理叙述，即从希腊半岛、经达达尼尔海峡，到叙利亚北境门比季 东行伊朗西部哈马丹、里海南岸、伊朗北部达姆甘,直至阿富汗西境赫拉特；然后北上苏联土库曼南境马里，再东行至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这条路应是罗马商团赴中国的路线，但不是返程路线。梅斯一行无疑取道地中海东岸推罗城返回马其顿。只有如此，梅斯才能向推罗城马林及时介绍他所率商队的中国之行。那么，他们回归途中要在阿蛮城改道西南行，穿过叙利亚沙漠绿洲帕尔米拉(Palmyre),经大马士革,最后到推罗城。

关于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上游与洛阳间旅行时间，马林(Ptolemy. Ⅰ. 11. 3)写道：

> 从幼发拉底河道城(指汜复城)到石塔(帕米尔某地)之间的距离是 876 波斯里或 26280 希腊里，从石塔到赛里斯国首都洛阳城(Sera) 之间的距离步行可达七个月，即由同一纬度算起，共 36200 希腊里。

按照洛阳到帕米尔 36200 希腊里步行需七个月计算，帕米尔到叙利亚北部门比季 26280 希腊里步行仅需五个月。如果，罗马商团 100 年 11 月觐见汉和帝后即刻踏上归程，翌年 6 月可达帕米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